

石人背铭的“玄机”

——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背铭的五重解读

武秀

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的“纪事”石刻，是隋代兖州刺史元匡修建“泗津桥堰”而设置。1993 年春出土于兖州泗河金口坝（现藏兖州博物馆）。因石人臀部刻有“此石人令守桥堰”之语，而命名为守桥石人、石人背部有“记事铭文”，其铭文称之为“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背铭”（以下称《石人背铭》）。因“石人背铭”中有“书于四石人背”语，可知当时石人共雕造了四尊。现存兖州博物馆两尊，第三尊仍埋藏在现兖州六中院内，第四尊下落不明。关于守桥石人的记载，曾见于光绪十四年《滋阳县志·古迹志·金石》和康有为的《广艺舟双楫》等文献。从已知的三尊石人的背铭互堪来看，其文字内容大致相同，可识者约 196 字。文字内容，记载了泗河之上的两个伟大的水利工程，一是建坝，二是疏渠。为祛洪护桥，特制石人记事镇厌。石人出土以来，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一些释读和研究，如康有为先生曾对其书法特点有过评价。但细研《石人背铭》，深感其文物的实证价值远未被发掘。《石人背铭》可确定一些悬而未决之事，澄清一些模糊之说，可补史书记载之缺，亦可纠文牍之谬，本文就《石人背铭》五个方面的重大意义解读如下，并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《石人背铭》证实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口坝的建造时间和功能。

兖州金口坝素有江北“小都江堰”之称，已作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，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其历史轨迹十分重要，尤其是建造时间。

兖州志书，对金口坝的建造时间确定为隋代，由兖州刺史薛胥建造，其根据是《北史》。此后的兖州志书，一直以《北史》为据，记载金口坝的始建年代。

《北史》记载：……兖州城东，沂、泗合而南流，氾濫大泽中，青遂积石堰之，决令西流，陂泽尽为良田。又通转运，利尽淮海，百姓赖之，号为“薛公丰兖渠”。“胥”乃隋文帝时兖州刺史薛胥。后世兖州史书记为：是隋代兖州刺史薛胥修建了金口坝，开挖了丰兖渠。

《石人背铭》载：（背部）大魏延昌三年，岁次鹑火，……来之众，率……事之氓，深长渠于洙水之南，起石门于泗津之下，时载三朔而绩立千秋。劳无一旅而……而石门之……杜。

大魏延昌三年，为公元 514 年（另一石人背铭剥落，肩部仅存“大魏延昌三年”6 字），由此证明：在北魏延昌三年（514 年）的元匡已用三月时间“起石门于泗津之下”。为金口坝的建造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时间证据。现在可以明确：金口坝的建造时间为大魏延昌四年即公元 514 年。比《北史》记载的时间早了约 76 年（因《北史》未载薛胥任兖州刺史建坝堰水的时间，推断当在公元 590 年）。

需要说明，这个时间，并非始建时间，在此之前，此地就应有坝桥之类的建筑，因为此处是联结着东到琅琊西至长安的古驿道。至于金口坝始建何时，有待文物的实证和文献的发现。

关于金口坝的功能。《石人背铭》记载：“以合镜黔鬣，愿兴郑白之铭而……和也……思树史起之碑……”虽然文字断断续续，但最关键的几个词语却神佑般地保留下来。“以合镜黔鬣”，就是为了百姓不再流离失所，能够安居乐业。郑白，战国时筑

郑国渠的郑国与汉武帝时筑白渠的白公的并称。史起，战国时人，仕于魏，魏襄王时任邺令。他在西门豹兴修水利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修水利工程，引漳水溉田，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，当地人民歌颂他为“贤令”。《石人背铭》中记载的元匡，就是将“起石门”“深长渠”工程的意义和郑国渠及白渠的价值等同起来。表明了工程主持者元匡的思想境界，难怪元匡在石人的臀部刻下“人蛟不得毁坏，有者毁坏、殃及万世”之语。

二、为研究北魏元匡提供了一条实物资料。

《魏书·元匡传》记载了元匡的事迹。元匡，字建扶，阳平幽王第五子，性耿介，有气节。孝文帝非常器重他，他是北魏朝廷中有影响、有地位、有故事的人物。《魏书·元匡传》记载了元匡跌宕起伏的一生，传中只有一句“出任兖州刺史”，并未记载他的具体业绩，《石人背铭》不仅记载了他筑坝堰水的民生事业，而且反映了他的高风亮节。《石人背铭》载：“……慕颜生之无施，乐孟氏之不伐，悉抑而不许，推而弗居，唯命题年月、纪时事，书于四石人背而已……”意思是：元匡慕效颜子不自夸，喜欢孟不反的不表功的品格。对铭记他个人的功绩的做法全都压下不允许，对功劳推而不居，只让记下修坝的年月及事件而已。此处连用《论语》中颜回和孟之反不自夸、不表功的典故，以表现元匡的耿介磊落性格，对研究历史人物元匡增加了一条重要的实物资料。

三、《石人背铭》可纠《北史》之谬，解决了关于兖州府河开挖的时间问题。

今兖州城内的府河明代以前为兖州城的南护城河，明代兖州城南扩后成了横贯东西的城中河，称府河。府河西流入洸河，向南又汇入泗河。流经兖州大地的这一段，北魏元匡任兖州刺史时称为“长渠”，隋代薛胥牧尧时称薛公丰兖渠。

府河是兖州历史上人工开掘的泗河的一条支流，因直通泗河，又称泗河或泗水。它对千年兖州十分重要，流经兖州大地，浇灌良田，使兖州变成粮仓；河水流经城市，解决城市生活用水，使这座古城千年不衰；河水补给兖州地下水，改善生态气候，使这里桑麻葱茏，人畜兴旺；兖州本为平原之地，路网纵横，又添此水利交通之便，使兖州这块地方物流、人流信息流丰富聚集，成为一块宝地；这也是千百年以来兵家必争的原因。这种将多种功能集于一体的水利工程，是平原地区水利工程天才的杰作，其综合利用的妙思，堪称典范，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上的水利智慧和人文情怀，值得被今人珍视和研究。

它利被千年至今犹存，其意义如此重大，它开挖的时间是哪个时代呢？

根据上述所引《北史》记载，“丰兖渠”是薛公“积石堰水，决令西流”，虽未言薛公开挖，但“号薛公丰兖渠”一语，足以让人理解是他开挖了丰兖渠。但《石人背铭》的记载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。《石人背铭》“深长渠于洙水之南”一句，值得探究。

先说“长渠”的位置何在？结合兖州泗河地理实体，元匡所“深”的长渠只能是后来的薛公丰兖渠，因为兖州城东泗河并无西流的另一条河流或沟渠。唐代杜甫登楼赋诗的少陵台还在，那是兖州城

的历史坐标。这个坐标之南的丰兖渠为明代之前的南护城河无疑。

再说长渠开挖的时间。说长渠开挖的时间，就要先说说《石人背铭》中的“深长渠”的“深”字。言：“深长渠于洙水之南”，即“深挖了洙水南面的长渠”。“深长渠”是在“原长渠”的基础上又挖了一下。“深”字不是形容词，而是动词。这说明，原来就有这条“长渠”。

由此证明，这积石堰水的工程，早已有之。而《北史》只言“薛公”，隐去元匡，只字未提丰兖渠的前事。又称“薛公丰兖渠”，有点“强争史名”了。当然，薛公牧尧时期，也可能元匡所修之坝已被冲毁，元匡所疏之长渠已淤积，薛公重新修坝清淤。但前事还是应该交代。是不知前事，还是知而不言，或另有其因，这耐人寻味。倒是元匡更为忠厚实在，以《石人背铭》如实记载，为我们找到了这个真相。但是长渠何时开掘？看来即非薛胥，也非元匡。开挖时间还应提前。这是《石人背铭》给史学者提出的新课题。

四、有补于对《水经注》中关于洙泗两水互授通称的理解。

兖州城东现在的这条河流称为泗河，泗河之上的金口坝，古代称石门，但《水经注》却说是洙水石门，洙水、泗水，多有争论。洙水为泗水的支流，应该没有争议。荀衍贤先生把石门考证到了现兖州城西洙水之上。著名李白研究专家安旗先生在论证“李白东鲁鲁家瑕丘”的文章中，虽然断定洙水石门即现在的金口坝，但对金口坝就是《水经注》上的洙水石门也语焉不详。这些问题出现在“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”出土之前，当然可以理解，由此更说明了“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”的重要性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《水经注》之后的《元和郡县志》（成书于公元 813 年）和《太平寰宇记》（成书于公元 979 年）两部重要著作在记述兖州尧祠位置时，一称“洙水之右”，一称“洙水之西”，皆将泗水记为洙水，为现代人理解泗河带来了误导。这一直是学术界悬而未决又给现实带来很大困扰的问题。为何将现代的泗水写为洙水呢？

我们的解释是：“洙泗互授通称”。其理由有三——

一是从洙泗流向看洙泗合称的缘故。泗水发源于陪尾山，经曲阜北向南，过兖州城东向西南。在城东的黑风口处，泗水分出人工开掘的丰兖渠经瑕丘城南西流入洸水，南流又汇入泗水。

洙水发源于新泰，在曲阜东北与泗水合流，至曲阜北分为二水，洙水经孔林西流折南，至现在兖州区酒仙桥街道田村南又汇入泗河，其入泗处即在现黑风口（丰兖渠东口）对岸的北边一公里处。以洙水汇入泗河的人口说长渠的位置是“洙水之南”，这就是《石人背铭》的角度。此处以南及长渠所流之水已是洙泗汇合之水，所以洙泗合称。

二是因孔子的名气，春秋时孔子讲学在洙泗之间，后人以洙泗作为儒家代称。洙泗弦歌一词，也将洙字放在了前边。缘于孔子的名气，在记载有关事物行文时，当然会将与孔子有关的洙水写进去。

三是《石人背铭》中，同一条河流，前言“深长渠于洙水之南”，后说“起石门于泗津之下”，也足以说明洙泗合流。在这里，洙水即泗水，两者可以互授通称。这对

《水经注》的理解，增加了一条证据。

五、《石人背铭》解决了李白杜甫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。

一是解决了李白杜甫分别的具体地点问题。李白与杜甫两个伟大诗人的友谊，传为千古佳话，历来是文人雅士谈论的话题。表现李杜情谊的诗作有李白的《鲁东石门送杜二甫》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等。李白、杜甫分别的石门在哪里？《石人背铭》给我们提出了重要证据。“起石门于泗津之下”，这就是说，金口坝在北魏称石门，为李白诗中的石门找到了铁证。

二是李白泗河泛舟的河段是哪里？李白的名诗《鲁东门泛舟二首》记述了李白杜甫的诗意之游，描写了当年泗河桃花夹岸的美丽景色，成为千古名篇，影响古今中外。

李白驾舟泛游的河段到底是哪里？说泗河泛舟，是对的。如从兖州泗河主河道去找“桃花夹岸鲁门西”就无法理解“鲁门西”。因泗河的主河道沿兖州城东南向西南流去，何言“鲁门西”？另外，宽阔的河面也不会产生“桃花夹岸”的感觉。鲁门，许多人理解为“鲁国之门”。其实此处的鲁门，是指鲁郡（即兖州）治所瑕丘城之门。唐代开元前的兖州和天宝后的鲁郡州治或郡治都是瑕丘城，因此，李白诗中称“鲁门”。当年李白泛舟之地就是《石人背铭》中的“长渠”，《北史》中的薛公丰兖渠，即现在的府河，唐代时人称泗河。丰兖渠的东段北侧，兖州城的东南，诸多文献证明就是“拥沙为山”的沙丘。李白的家就在沙丘的西北侧，鲁东门外，即李白所说的“我家寄在沙丘旁”。春风拂面，杨柳袅袅，李白从鲁东门外南侧的护城河上船，正值“天色将晚”，所以才有“日落沙明天倒开”的景色。因为河沙被水洗白，李白才有“沙明”之说。小船行至兖州城的东南入丰兖渠向西游去，丰兖渠的两岸桃花盛开，直到鲁城的西边，即“桃花夹岸鲁门西”。

依现代人对现在的府河的面貌来看，府河如此狭窄，怎能行船？《北史》记载丰兖渠的中八个字，很能说明问题，“又通转运，利尽淮海”。这说明，丰兖渠不仅能行船，而且能直达淮海。李白、杜甫乘船泛月，吟诗赏景，有何不可？

综上，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的背铭，解决了以上五个个重要问题。



北魏金口坝守桥石人（其一），现藏于兖州博物馆。

兖州的桥



酒仙桥 又称“九仙桥”，位于兖州城区府河之上，始建无可考，现存为明代建筑形制。桥为单孔拱券砖石结构，全长 16 米，高 8 米，南北走向，桥面两侧有石雕护栏。

酒仙桥是国纪念唐代伟大诗人李白而得名，因“九”“酒”同音，逐渐讹变为“九仙桥”。20 世纪 40 年代在城老东门处曾出土一古碑，俨然镌刻“酒仙桥”三字。由此可知“酒仙桥”方正宗桥名。

明万历二十四年版《兖州府志·崧阳县·桥梁》载：“曰九仙桥，在城东门。”清康熙十一年版《滋阳县志·桥梁》和光绪十四年《滋阳县志·建置志·桥梁》同记述为：“九仙桥，在黑风口之西。”清嘉庆版《大清一统志·兖州府·津梁》则载：“九仙桥，在滋阳县县门外黑风口之西，跨金口闸河。”

2010 年 6 月，兖州市政府投入专项维修资金 100 万元对酒仙桥进行了全面修缮保护。

2001 年 3 月，济宁市人民政府公布为（第三批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2015 年 6 月，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（第五批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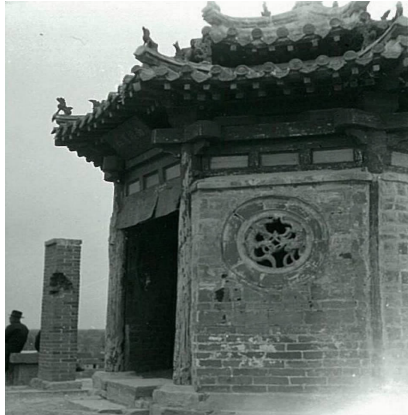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吴桥 位于新驿镇高吴桥一村村东原洸河之上。据清嘉庆版《大清一统志·兖州府·津梁》载：“高吴桥，在滋阳县西北二十里，跨洸水，宋元符初建。”又据今大桥南侧中孔洞上部镶嵌的《万历十八年重修高吴桥记碑》记载，知该桥于元代元统年间曾重修，其后明万历十八年复又重修。

现存古桥为明代建筑形制，五孔券砖石结构，东西走向，全长 56 米，宽 8 米，高 8 米。桥两侧建有燕翅，原桥栏板残损。

明万历二十四年版《兖州府志·桥梁》载：“曰高吴桥，在府城西北三十里。”清康熙十一年版《滋阳县志·桥梁》和光绪十四年《滋阳县志·建置志·桥梁》则记述为：“高吴桥，在城西三十，跨洸水。”

2016 年 12 月，济宁市人民政府公布为（第五批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按高吴，古地名。春秋时称高鱼，五代时称高梧。后改称高吴，桥即以地得名。其桥所跨洸河，上接洸河，下接会通，为济漕之源。该桥作为当时漕运历史的见证者，极具历史和文物价值。



据信图中建筑便是兖州的“南楼”，该照片拍摄于民国年间，牌匾上隐约可见“南楼**”四个大字。

登兖州城楼
东郡趋庭日，南楼纵目初。
浮云连海岱，平野入青徐。
孤嶂秦碑在，荒城鲁殿余。
从来多古意，临眺独踌躇。

《登兖州城楼》读记

佚名

马津。”

趋庭：《论语·季氏》：“（孔子）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诗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诗。他日，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。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”鲤，孔子之子伯鱼。后因以“趋庭”谓子承父教。《故太子太师徐公挽歌》（唐·王维）：“旧里趋庭日，新年置酒辰。”

海岱：指渤海和泰山。二者都在青州境内。《拟古诗》（南北朝·鲍照）：“海岱饶壮士，蒙洒多宿儒。”

平野：平坦广阔的原野。《言兵事书》（汉·晁错）：“平原广野，此车骑之地，步兵十不当一。”《渡荆门送别》（唐·李白）：“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。”

青徐：青州、徐州。《后汉书·齐永武王饒传》：“今赤眉起青徐，众数十万。”

大意：我来兖州看望父亲期间，初次登上兖州城楼放眼远眺。飘浮的

白云连接着东海和泰山，一马平川的原野伸展到青州和徐州。

孤嶂秦碑在，荒城鲁殿余。从来多古意，临眺独踌躇。

嶂：如屏障的山峰。《广韵》：“嶂，峰嶂。”《渔家傲》（宋·范仲淹）：“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”孤嶂：孤立的山峰。此指峰山（济宁邹城南南）。《孟子》：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故观于海者难为水，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。”这里的“东山”即峰山。

秦碑：秦始皇登峰山时命人所记的歌颂功德的石碑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（汉·司马迁）：“始皇二十八年，始皇东行郡县，上邹峰山，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，议封禅望山川之事”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曾五次东巡，登临的第一座山即峰山，并在山上立下第一块记功碑，由丞相李斯以小篆撰写。

鲁殿：鲁灵光殿。由汉景帝子鲁恭王在曲阜所建。《鲁灵光殿赋》（汉·王延寿）：“鲁灵光殿者，盖景帝

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……遭汉中微，盗贼奔突，自西京未央、建章之殿，皆见隳坏，而灵光岿然独存。”后比喻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。

古意：思古之意绪。《赋得长城斑竹枝》（唐·李频）：“细看生古意，闲倚动边思。”《怀灞上游》（唐·杜甫）：“眼前今古意，江汉一归舟。”

大意：秦始皇的石碑像一座高高的山峰屹立在这里，鲁恭王的灵光殿只剩下一片荒芜的城池。我从来就多怀古伤感之情，在此城楼远眺，感慨万端独自踌躇。（“古意”承“秦碑”。“临眺”承“纵目”。）

此诗是杜甫现存的第一首登楼诗。首联点题。因看望父亲来到兖州，初次登兖州城南楼。颌联写登楼远望所见。泰山东海浮云相连，平原旷野一望无际。颈联写登楼所思。想到了峰山的秦碑，想到了曲阜的鲁灵光殿。这个当年可与长安未央宫、建章宫媲美的鲁灵光殿早已荒废，只“余”下一座荒城。当然秦碑尚“在”，但秦朝二世而亡。“孤”立于峰山的秦碑早

成为后世劝诫好大喜功的反面教材。比杜甫略晚的唐朝诗人张继写过《读峰山碑》。其中写道：“谁知颂德山头石，却与他人戒后车。”杜甫或许也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更加委婉含蓄些。尾联说自己常有怀古伤感之情，今天目睹壮丽的山海辽阔的平野，想到不远处的秦碑鲁殿，又不仅动了感情，独自“踌躇”起来。杜甫没告诉我们他因何“踌躇”。他只是告诉我们“秦碑”尚在，请后人切忌好大喜功。“鲁殿”已荒，也请后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时三思而行。

杜甫作此诗时，正逢大唐盛世。按理没啥好踌躇的。但此时虽为盛世，已埋下安史之乱的种子。玄宗在开元中之后，日益好大喜功。开元二十三年（735）李林甫任宰相是重要标志。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，已不受重用的张九龄给玄宗送了《千秋金鉴录》作为生日礼物，颇有意义。年轻的杜甫未必能了解朝廷的整体状况。但朝廷的腐败，皇帝对内对外的好大喜功也不一定就没一点感觉。